

蘇聯紀行

萬建可



蘇

聯

紀

行

郭沫若著
東北書店發行

前記

五月二十八日的晚上，蘇聯大使館的費德林博士來訪，他遞給我一封信，是蘇聯科學院邀我去參加第二百二十週年的紀念大會。會將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兩地聯續舉行，自六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會期半個月。各國的學者除掉法西斯國家之外都受了邀請，我國有兩位，除我之外，另一位是丁燮林先生。

這自然是很光榮的事體，多年的宿望得到了這樣意外的滿足。朋友們都替我慶賀，開會歡送，設宴餞別，整整繁忙了十天。特別是立羣，她快要爲我忙壞了。拖着幼小的三子一女（頂大的漢英才六歲，庶英五歲，世英四歲，民英兩歲），還要爲我整備行裝，並奔走其它的事務。

六月九日乘美國軍用機離渝，道經印度、伊蘭、飛往蘇京。滿以爲在十六日以前一定可以趕到，但不料在路上就擱太大，一直到二十五日才到了莫斯科。慶祝大會已經移到列寧格勒去了。我雖然在二十六日的晚上也飛到了列寧格勒，算只僅僅趕上了大會的閉幕。好些貴重的學術報告

不會聽到，並且失掉了在大會上正式表示慶祝的機會，實在是美中不足的一件憾事。

同被邀請的丁先生比我到得更遲，他是六月二十九日才到莫斯科的。我們彼此談笑話，說我們都是落伍者，幕外人。這自嘲實在有說不出的辛辣味。中國的科學落後，仰仗別人的交通工具往來，就是做客也做不過別人的冠冕呵。

但我自己算好，在蘇聯受了特別的優待。我曾經飛到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中央亞細亞的塔什干、撒馬爾罕，又遊覽過託爾斯泰的故居雅斯拿雅、坡里雅拿。參觀了好些研究所、博物館、工場、集體農場、大學校、中學校、幼稚園；欣賞了話劇、歌劇、木偶劇、音樂、跳舞、繪畫；把晤過好些工人、農人、學者、作家、藝術家、工程師。在蘇聯足足滯留了五十天。時期雖然並不算長，但所看到的似乎比住了五十年的人還要多。

我自己是抱着唐僧取經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蘇聯去的，有了這樣好的機會，應該多學一些東西回來，但我却同樣抱憾。蘇聯值得學習的東西太多了，時期畢竟太短。自己的準備也太不夠，尤其是言語不通，要全靠朋友翻譯，耳朶又聾，連譯辭也聽不完備。我真有點『如入寶山空手回』的形像。十分抱歉，把朋友們的期待辜負了，尤其是蘇聯人民的厚誼。

朋友們很關切，在種種場合要我作報告，我作過了，而且翻來覆去地作過了。朋友們不能滿

足——事實上是我不能使他們滿足，還望我寫些東西出來。大約以爲我還有什麼好的資料保留着的吧。我現在索性把我這幾十天的日記傾箱倒篋地整理出來，作爲芹獻。但要告罪在先，假如不合口胃，依然不能滿足，不要以爲蘇聯就只是這樣或只有這麼一點點東西。

日 記

六月九日

天氣熱不可耐，昨晚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醒來的時候還不到四點鐘，趁着立羣和孩子們還在睡，率性把積下的字債還清了，一共寫了四十二張。

吃早飯的時候，世英問我：『爹爹，你到蘇聯去，好久回來？』我回答不出，眼淚有點洶湧。

自己的心境是在哀樂之間。能够到蘇聯，自然是多年的宿願，但把年青的立羣和幼小的兒女留在重慶，於心實在難忍。假使可能的話，我想在國外久住，或者率性往英美去遊歷一番。究竟什麼時候回來呢？實在回答不出。

發現洗臉時所常用的一面鏡子被人打破了，心裡很不愈快。爲什麼不早不遲，獨於在今天

我要動身的時候，鏡子被打破呢？儘管說那是迷信，心裡總有點暗然。

送行的朋友不斷的來，有帶照像機來的，也照了好幾張相。

立羣說我的頭髮太長，應該趕着去理一次髮，九點半鐘的時候，我在忙亂中把漢英一同帶了出去，在附近一家極簡陋的小理髮店裡把頭髮翦了。漢英，我們是打算讓他到飛機場去送行的。回家的路上，我不免有幾分淒涼地告訴他：

——漢英，你要大些。爹爹走了，你要好生聽媽媽的話，不要和弟弟妹妹們一同懊氣。

他默默地在我旁邊走着，沒有作聲。他似乎已約略知道了一些別離的滋味。

十一點五十分的時候，同朋友們一道用中飯。送行的人太多，只好輪流着立食。

剛好把飯吃完，蘇聯大使館的汽車來了。立羣叫人把小的孩子們帶開了，免得他們啼哭，連漢英她都臨時改變了計劃，叫他去睡午覺，不讓他到飛機場去了。

朋友們送我到市民醫院門口，握手告別了，只有少數的人，分乘着兩部汽車，向枇杷山駛去。

天氣熱得難耐，到了大使館的時候，安南略先生接待着我們，開了幾瓶香檳酒以壯行色。飛機是兩點鐘起飛，時間已經迫促，沒有多作逗留，便趕緊動身。米克拉雪夫斯基參事也趕來了，

他本打算到飛機場的，但因中暑，有些熱，便中止了。

安先生，蘇牧先生，立羣，我，同坐上一部汽車。一回國述職的邵魯諾夫先生，他同行李另外坐著一部，由枇杷山出發，經由兩浮支路，駛向九龍坡的飛機場。

九龍坡離城十二公里，飛機場臨着長江，並不甚大。這兒立羣和我都是第一次來。飛機場是一層的建築，背着江面，周圍有些洋槐圍繞着。突內進門處一左一右有兩個櫃台間，左手是美國人辦公的地方，右手的是中國人。一進站，先在右手間投到，據執事的人說：中國人出境還要有外事局的許可證，不然便不能起飛。這一消息出乎意外。因為時間太迫促，還要回城辦許可證，萬萬來不及。外事局照別國的慣例應該是管理外國人出境的事情，今天剛剛相反，打電話進城去一時得不到着落，安先生又連忙派了一部汽車回城，請大使館就近辦理，我們便坐在站裡等候回信。

費德林博士趕來了。製片廠的司徒慧敏兄和另外的幾位攝影同志也趕來也。等到快要兩點鐘了，許可證還沒有消息。執事的人來催問，假使得不到許可證，要到美國人那邊把乘機證取消。我心裏爲這事反而有點高興：今天能夢不走，率性走不成，倒更好。人事是盡了的。外交部發了護照，美軍司令部也特別優待，沒想出還有這麼一道難關。

然而碰巧，飛機遲了刻。不僅二時沒有到，就是三時，三時半，都沒有到，而許可證也同飛機的遲到在比賽，遲遲地得不到後的着落。時間沉悶地過着，熱，汗，電扇鼓着溫風。

快要到四點鐘了，對山有號角的聲音，報告飛機到站。那就是我們所等待的飛機。飛機的人都在作準備了，許可證還沒有送到。執事的中國人又來說，要去取消乘機證了。但就在這時候，右手内部的辦公室裏面又有人出來，說是接到城裏的電話許可乘機。這一來，我好像得了赦令，但又好像受到了判決，無論如何非走不可了。我有點茫然。立羣爲我倒了一杯涼水來讓我喝，又把手巾蘸濕讓我抹了一次臉。送行者的姓名都被調查了，我們便動身走出機站。立羣只向我說了一句話：到那邊去少喝些酒啊。我在心裏發了誓，絕對要記住她的叮囑。

在一架中型的運輸機下和大家握別，攝影的朋友們不斷地攝影。當我和立羣握別的時候，費博士很愈快地說：假使在我們蘇聯，是要來這一套的。他把兩手比成擁抱的形式。但我們沒有擁抱。

上了飛機。立羣在下面對我說：他們還要我們演一個場面。慧敏兄導演着，要我從飛機上和立羣握手。管飛機門的一位美國青年，含着笑，閃開了。攝影完畢，砰的一聲，鐵門關上了。

飛機上的座位在兩旁的窗下，可以坐三四十人光景，但乘機的只有九個人。座位兩旁有繫腰的板帶，要起飛了，機師叫把板帶鉤上以免震蕩。待飛到了上空，又叫把板帶解鉤。後來在下降的時候也這樣，對於旅客的便利，注意得相當周到。

坐在飛機上起初也還有點茫然，待一飛定了，在上空發生着清涼的感觸，腦子裏的回憶就像突然開了閘一樣，湧湧了起來。

八年的抗戰當中，自己所曾參預過的差不多每一個場面都錯地迅速地揀換着，但一想到前途便突然現出一片白光。計自四點二十分起飛，七點二十分到達昆明，在空中足足飛了三個鐘頭，腦子裏的回憶也湧了三個鐘頭。

昆明的飛機場很大，不斷的有飛機起飛或降落；有大風，只見塵砂濛濛。天氣倒很涼快，有點像重慶的晚秋。飛機站很簡陋，牆是土磚砌成，屋頂有些漏洞。來去的都是美國的士兵，人數很多。在站上辦好了手續，要明天午後四時才能繼續航程，當晚便落宿在飛機場內的美軍招待所。那是臨時性的白落庫（BARRACK），每間屋子裏面對放着四尊床，在屋底靠窗一張長

條桌。我們落宿的一間已經先有兩位美國兵住着，正在光着身子在電燈下納涼，看見我們進門，他們把衣服穿好出去了。

浴室裡面只有漏篷設備，沖浴了一次，同邵君往食堂進餐。定食，很簡單，但很豐富。咖啡盛以龐大的乳白玻璃盅，可以任人牛飲，這却需要相當粗大的神經。

一切都是美國式，雖感方便，但亦頗覺生疎。很想到昆明市上去看看，聽說還有十來公里，沒有交通工具，也就只好作罷。

未出中國境便已經成爲一個外國人了。

六月十日

晨六時起床——時間還是重慶的戰時時間，應該還只五時。太早，其它的人還還沒有什麼動靜。到盥洗室裡去洗了臉，回到居室時，發覺手錶還放在盥洗室裡，連忙回頭去找尋，却不見了。一位老公役，中國人，在那兒打掃。我疑心是他拾去了，但也不好詰問。他看見我的情形，很安閑地問我：是不是在找錶？我答應了他，他從衣包裡取出了錶來還我，神色愈是安泰。我起

了肅敬的念頭。盥洗室裡面有禁制：『用水有礙，不能進口』。有一個大水囊掛着，我知道是漱口用的，囊腳有幾個水栓，但不知道怎麼開。我在這時才請教那老公役，他把兩個指頭套上水栓的兩翼，用拇指把挺出的活塞向內壓，水便從水栓下的一個小孔裏面流出了。我非常感謝。今天真是利，一清早便遇着這樣的大好事。

昨晚睡得不甚好。天氣涼，我蓋上了毛氈，本很暖和，但不知道怎的，兩腳的魚肚筋老是抽筋。

在食堂裏用了早飯，請食堂中的一位中國僕歐引路，我們到達了公路，在那兒搭上了美國軍部的交通卡車，便往昆明城裏去。公路兩旁的風景樹很茂盛，樹葉肥厚，有點亞熱帶樹的風味，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乘十餘公里達到城區，街道却很凌亂猥雜，蒼蠅拉圾乞丐觸目皆是。吉普車穿梭式的來往，看起來美國兵好像比昆明市民還要多——當然還只是我的錯覺。實際是遍街都是閑人，和重慶市頭並沒有兩樣。想像中的昆明是要更美麗些的，我有點失望了。

昆明朋友們的住處，我一個也不記得。開始想到正義街去訪一位報館裏的朋友。但想在清早，過記者生活的人恐怕還沒有起床。在街頭看見有『聯大工學院合作社』的招牌，走進去探問聞一多吳貽諸位先生的住址，知道他們住在城外，路太遠，而且又是星期，不一定在家。沒有辦

法，只好在街頭流浪。

街上有黃包車，車夫的雲南話却不大好懂。我問他們昆明有沒有中蘇文化協會，他們也很茫然。我改變了計劃，向街頭過路的學生樣的青年問，這一問却立地收到成功。一位操廣東音的青年告訴我：在拓東路勝利橋側臨江里。他叫我們回頭走，走不好遠的那座橋就是勝利橋，過橋向左手，沿着城壕的那一帶就是臨江里了。我們照着路向走，果然找到了一家門戶，有綠色油漆的鐵柵門，懸着『中蘇文化協會』的長牌。

秘書楊須知先生和其它五六人正在樓下的會議室裏面準備開座談會，要討論關於蘇聯的什麼。我們本來是不認識的，但一說明便都成了熟朋友，受着了很懇切的招待。我打算會田漢、光未然、聞一多、吳貽諸位先生，一位朋友乘着自轉車便去分頭通知去了。邵先生參加了座談會，我却坐在一邊把清早沒有寫完的一封信又拿出來寫，想趕着付郵寄給立羣。

● 我手裏只有一節長不滿一寸的斷鉛筆，還是今天清早在寢室裏的長桌上拾得的。

——你沒有鋼筆嗎？一位朋友問我。

——有是有的，被人抽去了，這兒又引起了我一段新鮮的回憶。

是六號的晚上，文工會的舊友們在我家裏，開過一次小規模的餞別茶會。並不怎麼寬的書房

裏，坐了四十來往個人。我掛在壁上的上衣插着鋼筆，第二清早才發現不翼而飛了。大約是誰取下來記錄，記了插回原處的吧。

那隻鋼筆在我是很值得紀念的，那是墨色有黃環帶的一隻頭號派克。前幾年寫史劇「屈原」的時候，寫得太快，把筆尖觸斷了。費德林博士也有一隻同樣的筆，他便送了我。斷了的筆尖，後來修理好了。同樣的筆我便有了兩隻，因此筆套頭便每每混用。然而區別畢竟是有的，費博士贈我的一隻筆桿上刻有一個「費」字，我自己的一隻筆套頭上的塞子是掉了的。結果遺失的是我的筆桿，費的筆套，留下的是我的筆套，費的筆桿。這樣值得紀念的東西，我不願意它再遺失，便留在家裏讓立羣使用，我是打算到了加爾各答買一隻新的。

楊秘書把自己的鋼筆借給我，我把信寫完了，便託他用航快寄出。

光未然來了。太不湊巧，聽說田漢下鄉去講演去了。本來在中午是有一次聚餐的，寄寓昆明的前政治部第三廳和文化工作委員會的朋友們要作一次會合，就因為田先生有講演，趕不回來，改到晚上去了。

乘自轉車的朋友也回來了，接着是聞一多和吳貽兩位先生。多年不見了，意外的會合使得大家興奮，又因時間短促，更覺得珍惜。大家都希望我能够再留一天，邵先生也有這個意思，我

倒很想早走，希望能夠去趕上科學院的開會。這只好等飛機來決定了，假使午後四時沒有飛機，我們就斷然留下。

在冠生園一同吃了一頓中飯。把飯吃完之後，已經是兩點鐘了。王晉笙趕了來，很有點不自然的樣子。他一見到我便提到「孔雀膽」的上演稅。「孔雀膽」去年十一月在昆明上演，收入在一千六百萬元以上，照百分之三的比例，應該付我至少四十萬元的上演稅。但他一直拖欠着。他說了一些抱歉的話，又說要利上加利的付還，決不失信。我自然也感謝了他。（不過在我整理日記的今天，上演稅還是沒有消息。）

是上飛機的時候了，大家要一同去，却没有方便的汽車。在這兒晉笙費了氣力，他去找了一部很古式的大轎車來，坐上了十幾個人。到了飛機場的時候，四點鐘確是有飛機，便只好同大家告別。

飛機是五點鐘起飛的，機型較大，坐滿了美國的士兵，一共有五十來往個人。飛得很高，甚爲平穩，曾用養氣口罩一次，並不覺得有什麼不舒適。只是冷得有時不能支持，我把隨身帶着的手氈裹上了。約略飛了兩個鐘頭的光景，在密支那降落，乘客們通下機用晚飯。熱意如蒸，完全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一個鐘頭之後又繼續飛行，又曾用養氣罩一次。乘機的人多裹上毛氈，在機底上和衣而臥。將近十二時，到了加爾各答。邵先生的行李很多，而且都很大而且重，在機場上逗留了很久。一位彪形大漢，面孔有點像鬪牛狗一樣的英國警吏緊緊跟隨着我們。把行李捆上一部吉普車，在街道上跑了很長的時間。雖然已是深夜，但街道兩旁時有牛車往還，有不少的印度人在露天中過夜。跑了半小時光景，車子駛進了一座大建築的前庭，停住了。我以為是旅館，進去之後才知道是稅關。還不是辦公的時候，彪形大漢叫我們等候。到了一點過鐘才開始檢查，彪形大漢的那雙眼睛，鼓得像兩拳頭。邵先生是外交官，他的行李是不受檢查的，我的兩口皮箱便受了澈底的光顧。算好，我自己並不是違禁的人，也並沒有攜帶什麼違禁的物品，雖然麻煩了將近一個鐘頭，算也通過了。

行李檢查完畢之後，本該出關了，但找不到旅館。邵先生和我都是初次來印度，毫無經驗，便只好坐在稅關裏面過了一夜。

六月十一日

宏大的稅關在半夜經過了一番忙亂的檢查之後，稅警們都散了，只乘着煌煌的電燈照着幾個屋頂電風扇在那兒焦燥地旋轉。幾位印度僕歐，就像燒焦了的幾架死尸一樣在水門汀的地面上瞓睡着。

六點鐘的時候，有一位紅頭巡捕進來，把僕歐們蹴醒了。有幾個拿了一種特殊的掃帚來拖地。那是用繩子綁的一大簇的植物纖維（似乎是麻），有四尺長的光景，沒有把柄，只是用繩子拖。用起來好像很不方便，但看他們悠閑地拖來拖去，似乎也不十分費力地把地面拖乾淨了。

我走出庭前去看了一下，看見那兒的街名是滑鐵爐路（WATERLOO ROAD）。街沿上也還睡着好些印度人。不少的灰頸烏鴉在街上爭吃死老鼠。

七點鐘的時候，邵先生和蘇聯商務代辦處通了電話，不一會有一位蘇聯朋友坐汽車來照拂我們。原來那稅關的樓上便是一家大旅社，是有樓門可通的。我們被引向右手的樓門，但還鎖着，只得又退回來，坐着汽車，轉了一個街角，便到了旅舍的門口，是 GREAT EASTERN HOTEL（大東旅舍）。

旅舍的客房聽說已經住滿，在一八七號房裡已經住了三個人了，臨時又安上兩尊行軍床，勉強住下。在食堂裡用了早飯，將近十點鐘的時候，商務代辦葉爾辛先生來訪，有五十上下的年